

第二语言学习的语言能力倾向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江 新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tudies in the West on language aptitude. The aim is t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on language aptitude and promote our own research work. The paper consists of 4 parts: 1. A review of the earlier work on language aptitude; 2 a discussion of some controversial issues concerning language aptitude tests; 3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research on language aptitude; and 4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language teaching.

不同的人学习第二语言的速度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与学习者的个人因素有很大关系,其中语言能力倾向(language aptitude)是影响第二语言学习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个人具有的完成语言学习任务的具体能力(Carroll, 1981)。如果从个人学习语言材料或发展语言技能所需时间的角度给语言能力倾向下一个操作性定义,那么语言能力倾向就是能够促进语言材料学习、加速语言技能发展的一整套能力(Gardner & MacIntyre, 1992)。

国外对语言能力倾向的研究,开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研究资料。最近,国内也有研究者结合汉语水平考试(HSK),对语言能力结构进行过有意义的探讨(陈宏,1996,1997;张凯,1995,1997),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本文对西方语言能力倾向的研究进行综述,目的是增进我们对语言能力倾向这个影响学生语言学习速度的重要因素的了解,以便根据我国语言教学实践的需要开展语言能力倾向研究。

为了便于下面的讨论,首先要弄清“能力倾向”这个概念。在心理学上,能力倾向(aptitude)是一个很常见的概念(参见荆其诚,1991;朱智贤,1989)。能力倾向(又称性向)指个人在某个领域经过学习或训练可能达到的某种能力水平,它不是已经具有的现实能力,但是在已有能力中可以显示出来,可以对它进行测量,并且可以预见经过进一步的训练,能够在某个特定方面取得成就。能力倾向分为一般能力倾向和特殊能力倾向。一般能力倾向指个人在广泛的活动领域达到某种能力水平的可能性,智力测验所测的就是一般能力倾向,它是完成各种活动都必需的。特殊能力倾向是在某个特定方面例如音乐、绘画、体育等达到某种能力水平的可能性,它是完成某一方面特殊活动所必需的。语言能力倾向也是一种特殊能力倾向。无论是一般能力倾向还是特殊能力倾向,都是指可能发展的潜在能力,而不是已经发展的实际能力。

能力倾向测验(ap titude test, 又称性向测验)就是测量一个人适合做什么,即他在哪个方面最有潜能,最能作出成就的测验。能力倾向测验常常指特殊能力倾向测验,通常是成套测验,它的主要目的是对将来的成绩作出预测(郑日昌,1988)。和一般能力测验相比,能力倾向测验对学习和训练的预测效果更好。

一 语言能力倾向的早期研究

关于语言能力倾向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编制语言能力倾向测验上。

在本世纪上半叶,研究者开始编制能够预测第二语言学习成绩的语言能力测验。Henmon(1929)对有关研究进行较早的综述,他发现最初的研究集中在智力即一般能力测验上,但是后来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编制特殊能力测验上,例如 Iowa 测验(Stoddard & Vander Beke, 1925),Luria- Orleans 测验(Luria & Orleans, 1928),Barry 测验(Rice, 1929)等等。这些测验的目的都是预测第二语言成绩,测验主要采用语法翻译练习,测验分数与语言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不是很显著。

这种编制测验预测第二语言成绩的积极热情在三四十年代降温了,但是到了五十年代,Carroll 对语言能力的研究又重新引起了人们对这种测验的兴趣。Carroll 出版了最著名的语言能力倾向测验——现代语言能力倾向测验(Modern Language Aptitude Test, MLAT)(Carroll & Sapon, 1959)。

在最初的研究中,Carroll 对参加语言学习教程的军人进行大量的成套能力测验,然后进行因素分析,得到了几种能力,他认为这是成功习得一门第二语言所必须的。通过这个研究以及后来的其他研究,Carroll 提出语言能力倾向由四种成分构成:(1)语音编码能力(phonetic coding ability),指识别不同语音、在语音和符号之间形成联结并保持联结的能力。(2)语法敏感性(grammatical sensitivity),指识别词(或者其他语言单位)在句子结构中的语法功能的能力。(3)记忆能力(memory ability),指迅速有效地学习语音和意义之间的联结并保持这种联结的能力。(4)归纳性语言学习能力(inductive language learning ability),指根据给出的例子对某类语言材料的内在规则进行归纳和推论的能力。

Carroll 和 Sapon(1959)编制的“现代语言能力倾向测验”(MLAT),是一个测量青少年和成人外语能力倾向的测验,它由下列 5 个分测验组成:(1)数字学习(number learning):首先让受测者记忆某种人工语言的几个数字,然后将这几个数字组合进行听写。例如学习数字 1 至 4,加上 10 和 100,然后听写这几个数字的组合,例如 42, 312, 122。该测验主要测量联结记忆能力。(2)语音记录(phonetic script):受测者首先学习某些英语音素的发音,然后进行测验,例如“在你听到的语音下面划线: Tik; Tiyk; Tis; Tiys”。该测验测量语音编码能力。(3)拼写线索(spelling clues):受测者根据给出的某个词的发音线索,猜测该英语词的拼写。例如根据“ernst”猜“earnest”,在几个候选词中选择一个正确的词。该测验测量母语词汇以及语音编码能力。(4)句子中的词(word in sentence):受测者在一个句子中识别出某个词或者短语,该词或短语的语法功能与另一个句子中的某个词或短语的语法功能相似。例如呈现两个句子,在第一个句子中有一个词划线,在第二个句子中有五个词划线,受测者的任务是在第二个句子的五个划线词中选择一个词,该词的语法功能与第一个句子的划线词相似。该测验测量语法敏感性。(5)配对联结(paired

associates): 受测者先学习一个英语与外语的对译词表, 然后进行多重选择测验。该测验测量联结记忆能力。

可见, 语言能力倾向的前三个成分在 MLAT 中得到了测量, 但是第四个成分“归纳性语言学习能力”没有得到很好测量, Carroll 自己也承认这一点。MLAT 最初是为美国外事服务研究机构的外语课程招生而编制的, 后来有各种版本, 包括小学版 (Carroll & Sapon, 1967) 和简缩版。MLAT 可用于 14 岁以上的人, 小学版 (EMLAT) 用于 8- 11 岁儿童, 简缩版可在测验时间有限时使用。除了英语版之外, 还有法语版 (Wells et al, 1982)、意大利语版 (Ferencich, 1964) 和日语版 (Murakami, 1974)。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版本来测量语言能力倾向。

另一个著名的语言能力倾向测验是 Pimsleur (1966) 的“语言能力倾向成套测验” (Language Aptitude Battery, LAB), 是为 13- 19 岁的青少年设计的, 它由 6 个分测验组成: (1) 年级平均分 (grade point average); (2) 兴趣 (interest); (3) 词汇 (vocabulary); (4) 语言分析 (language analysis); (5) 声音辨别 (sound discrimination); (6) 声音与符号的联结 (sound-symbol correspondence)。Pimsleur 认为, 这 6 个分测验的目的是测量语言能力倾向的三个成分: (1) 言语智力 (verbal intelligence), 测量对词的熟悉性以及对话言材料的推理分析能力; (2) 动机 (motivation); (3) 听觉能力 (auditory ability)。

由此可见, LAB 很强调语言分析能力和听觉能力。强调听觉能力, 原因是 Pimsleur 研究发现, 20% - 30% 的儿童外语学习不成功是因为听力差造成的, 尽管他们的其它能力处于正常水平 (Pimsleur, Sundland & MacIntyre, 1966)。还可以看到, Carroll 和 Pimsleur 关于语言能力倾向的观点有两点不同之处。第一, Carroll 将动机看成是一个与能力倾向无关的变量, Pimsleur 将它看成是能力倾向的一个成分, 因此在他的能力倾向测验 LAB 中用分测验 2 来测量动机。第二, 言语智力在能力倾向中的作用程度。Pimsleur 认为言语智力是能力倾向的一个重要成分, LAB 的分测验 3 和 4 主要是为了测量言语智力。Carroll 认为言语智力并不是语言能力倾向的一个必要成分, 但是他承认 MLAT 的“拼写线索”分测验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言语智力和词汇知识, 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预测指标。

尽管 MLAT 和 LAB 有这样的差异, 但是在对不同语言课程的青少年和成人的语言成绩的预测方面, 它们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Gardner (1980) 发现加拿大英裔儿童的 MLAT 分数与他们的法语评定等级水平之间有中等程度的相关 ($r = 0.41$)。很多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Carroll 自己特别提到能力倾向测验对外语成绩的预测效度系数一般在 0.4 至 0.6 之间。语言能力倾向测验的确为语言学习能力提供了一个合理的估计指标。至今为止, MLAT 和 LAB 是语言能力倾向研究最常用的测验。

二 关于语言能力倾向测验的争论

虽然有证据表明 MLAT 和 LAB 可以成功地预测学生外语课程的成绩, 但是关于语言能力倾向测验仍然存在很大争论, 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焦点问题上, 一是语言能力倾向测验是否真正测量了潜在的语言能力? 二是智力和语言能力倾向之间是什么关系?

有的研究者认为 MLAT 和 LAB 没有测量到潜在的语言能力倾向。他们的理由之一

是,语言水平不只是语法知识和声音辨别能力,还应该包括交际能力,语言能力倾向只测了前者,没有测量后者(Ellis, 1985)。交际能力在效标测量中可能也没有得到评价,效标测量只是某门外语课程的最后评分。语言能力倾向测验之所以能够预测语言学习成绩,是因为测验与课堂学习的任务一致(Spolsky, 1979; Wesche, 1981),而不是因为测验真正测量了潜在的语言能力。

Cummins(1979)认为语言水平有两个不同部分,一是认知/学术专业语言水平(cognitive/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CALP),二是基本人际交际技能(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BICS)。认知/学术专业语言水平(CALP)指总的语言水平,相当于智力中的一般因素,基本人际交际技能(BICS)指口语流利程度和在社会交往中适当使用语言所需的技能。语言能力倾向测验可能很好地测量了CALP,但是忽视了BICS。Krashen(1981)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提出能力倾向测验与“学习”有关,与“学得”无关,MLAT所测的技能只是课堂语言学习所要求的。MLAT可以很好地预测CALP,但不能预测BICS。

很多研究支持CALP与智力有关的观点。Genesee(1976)发现学生的智力与他们的法语(第二语言)词汇、语法和阅读技能有关,但是与母语者对他们的口语技能的等级评定分数无关。Ekstrand(1977)发现智力与阅读理解、听写和自由写作水平的相关比较高,但智力与听力理解、口语水平的相关比较低。

Neufeld(1978)提出,每个人都具备掌握语言技能的能力,但是不同的人掌握高级语言技能的能力不同,这取决于个人的智力,不存在先天的语言能力倾向。Oller和Perkins(1978)的观点与之相似,他们认为语言习得不存在特殊的能力倾向,智力的一般因素就可以解释语言水平的大部分变异。

对此,Carroll(1981)和Skehan(1986)进行了反驳。Carroll(1981)提出,虽然智力与语言能力倾向可能有交叉重叠,但是这二者不是等同的,因为许多外语能力倾向测验与外语成绩之间的相关高于智力与外语成绩的相关。Skehan(1982)对外语能力倾向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用语言能力倾向预测外语学习成绩比用言语智力更加有效,语言能力倾向与言语智力不是等同的。

Skehan(1986)认为能力倾向测验之所以能够很好地预测语言成绩,不仅因为它的确测量了内在的语言加工能力(这种能力在学习第一和第二语言中是相同的),而且因为它测量了使用非语境(decontextualized)语言的能力(例如正规语言测验测到的就是使用非语境语言材料的能力)。他提出这个观点的证据,来自他对Bristol语言项目(Wells, 1985)被试的继续研究。Bristol语言项目是一项对英国Bristol地区的125名儿童第一语言发展的纵向研究。Skehan对Bristol项目中的64名大年龄被试进行了语言能力倾向测验,他发现:语言能力倾向与第一语言发展之间的相关大多数是显著的;语言能力倾向与外语成绩之间相关也很显著。而且,语言能力倾向不仅与第一语言发展之间有正相关,与家庭社会阶层也有正相关。虽然儿童的口语能力与家庭的社会阶层无关,但是儿童的文字能力、将语言本身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能力与家庭的社会阶层有关,即儿童处理非语境语言的能力与社会阶层有关。这个间接证据表明处理非语境语言的能力在语言能力倾向测验中得到了反映。Skehan(1986)认为语言能力倾向测验测量了语言加工能力和处理非

语境材料的能力,这两种能力对语言学习都很重要。

最近, Gardner 和 MacIntyre (1992) 在一篇综述文章中提出, 语言能力倾向促进语言习得的可能原因之一是正迁移。如果一个人拥有的知识或技能与新技能或新知识相关, 那么可以推论他对新材料的学习也会快得多。也就是说, 语言能力倾向可以看成是一块认知海绵(cognitive sponge), 如果某种能力对某种新技能的习得是适宜的, 那么该技能就会被这种能力所吸收, 如果个人的这种能力发展得很好, 这种技能的获得就比较快, 如果不是, 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才能把它变成个人能力的一部分。这种解释得到了 Wesche (1981) 和 Skehan (1986) 研究的支持。Wesche (1981) 利用能力倾向测验和访谈将语言学习者分为三组: 分析能力强组、记忆能力强组和两种能力相当组。然后分别采用与能力匹配的不同方法进行训练, 发现与能力匹配的训练导致较好的语言学习结果。也就是说, 当个人的能力与学习的材料相匹配时可以促进学习。Skehan (1986) 证明不同的学生能够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学习语言材料。他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在英国语言军校学习阿拉伯语的学生进行分类, 所得结果虽然不是很明确, 但是也可以说明, 有的语言学习者对语法很敏感, 有很强的归纳学习能力(分析型), 有的人记忆能力、组块学习能力很强(记忆型), 这两种类型的语言学习者都可以获得成功。将语言学习能力倾向看成是一块认知海绵, 这种观点表明, (1) 如果要研究语言能力倾向的性质, 那么就要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实际过程, 以了解哪种技能或知识是在哪种环境下获得的。确定了与这些技能有关的能力之后, 对它们进行测量, 这样对成绩的预测就可以得到改进。(2) 这种观点有助于区分智力和语言能力倾向。智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学生对指导和解释理解的好坏, 影响学生根据任何一种学习经验对指导和解释进行推论(参见 Carroll, 1962), 语言能力倾向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促进新技能向已有技能的正迁移。这种观点清楚说明, 智力和语言能力倾向在正式和非正式语言学习环境中都起作用。(3) 这种观点还可以解释智力和语言能力倾向之间之所以存在正相关, 是因为它们在相同技能上有共同变异, 但在因素分析研究中又可以获得相对独立的维度(参见 Gardner & Lambert, 1965)。

将语言能力倾向和智力进行区分, 有人可能要问语言能力倾向是怎么来的。Carroll (1967) 发现, 开始学习外语的年龄和 MLAT 分测验分数之间没有相关, 说明其他语言的学习和训练经验并不影响语言能力倾向。由此看来, 大多数语言能力测验的设计主要集中于第一语言技能、记忆、语言分析等, 这样做是合理的。而且, Carroll 确定的基本能力——语音编码能力、语法敏感性、记忆能力、归纳学习能力——并不轻易受其他语言训练的影响。Skehan (1986) 的研究也证明语言能力倾向来源于第一语言能力。他发现, 第一语言发展较快的学生, 童年期词汇较丰富的学生, 家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学生, 在能力倾向测验上的得分比第一语言处于劣势的学生要高。这个结果说明, 存在一种语言能力倾向, 这种能力倾向影响任何环境下的语言学习(参见 Skehan, 1991),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

对智力和语言能力倾向的分析有助于说明它们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无论是在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语言学习环境中, 二者都起作用。在任何一种环境中, 如果语言学习材料不是用最佳条件呈现的, 智力和语言能力倾向这两个因素都可以解释语言学习成绩的差异。如果学习材料和指导语比较清楚明确, 那么智力上的要求就会降低, 智力的影响

就会比较小;如果课程计划得比较好,机会和练习比较充分,那么能力倾向上的要求就会降低,能力倾向的作用就会减少。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能力倾向和智力这两个因素都与成绩有一定程度的相关。

三 语言能力倾向研究的新进展

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关于语言能力倾向的研究非常多。但是从那以后研究越来越少了。原因之一是,在六七十年代,能力倾向模型和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行为主义语言学习观点和听说法语言教学观点有密切关系。当这些观点遇到挑战时,人们对能力倾向的兴趣也随之降低了。

到现在,MLAT 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很多研究者提出,语言教育和心理测量发展了,要求能力倾向测验也要发展(参见 Mcl aughlin, 1990; Spolsky, 1989; Skehan, 1989)。Bachman (1988)在一篇综述文章中谈到,语言教学和语言测验发展的新成果,有的对第二语言学得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Skehan (1991)认为目前的语言学理论和实践为能力倾向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对语言能力倾向测量的研究应该在多种学习环境中进行。要求编制新的能力倾向测验的呼声越来越强。

对于这些要求编制新的能力倾向测验的呼声,Carroll 提出这样的问题:已有的方法有什么不对?是需要做一些细小的修改还是需要根本变化?

Carroll(1990)确实提出,应该对 MLAT 进行一些小的修改。他认识到另一种形式可能有用,在数字学习测验中的词汇部分应该撤消词汇与词汇代表的数字之间字母联系。他也感到应该提高语音记录测验的难度水平以消除该测验分数分布的负偏态,“拼写线索”分测验的指导语应该修改以强调该测验在速度上的要求。他引用 Wesche(1981)的研究,特别提到,听的能力,从听觉敏锐程度到忽视干扰的能力都有不同,但是在 MLAT 中只测量了其中的一部分。

虽然 Carroll 认为语言能力倾向测验应该改进,但是他对在现有基础上大大提高外语能力倾向测验的预测能力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认为改进之后的语言能力倾向测验对成绩的预测效果不会有太大的提高。尽管如此,他也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包括:(1)对现在的测验和程序做一些细小的修改;(2)通过吸收认知能力研究的最新成果,将测验工具扩展到多个外语能力倾向领域;(3)对外语学习包含的认知操作做进一步的研究,研制更加符合这些认知操作特点的测验或其他方法(例如工作样例任务)(1990, p. 27)。

然而,几乎没有人去努力编制另一种新的语言能力倾向测验。但 Parry 和 Child (1990)是个例外,他们根据一种人工语言(其语法系统与 Turkish 的语法类似)编制了一种新的能力倾向测验 VORD。VORD 测验将语言学习任务 and 语言分析任务结合在一起,测验由四个部分组成:名词词法(Nominal Morphology)、动词词法(Verbal Morphology)、短语和句子水平的句法(Phrase and Sentence-Level Syntax)和完成课文(Text Completion)。在一次只有 36 名成人被试的小规模研究中,Parry 和 Child(1990)发现 MLAT 对语言学习成功的预测总体上比 VORD 好,这证实了 Carroll(1990)对提高语言能力倾向测验预测能力的怀疑。该研究还发现 VORD 和 MLAT 的分测验之间的 20 个相关中有 14 个是显著的,说明这两套测验的分测验有许多共同变异。这只是该测验研究

的第一步,但是它可能指出了语言能力倾向测验的一个新路子。

Skehan (1991) 认为目前的语言学理论和实践为能力倾向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对语言能力倾向测量的研究应该在多种学习环境中进行。他提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语言能力倾向的研究:第一,吸收当前的语言理论和语言学习理论,对能力倾向的基本模型进行修改。第二,对能力倾向测验进行修改,使测验更好地反映 BICS 包含的能力。第三,研究需要在各种语言学习环境中进行,包括正式的语言学习环境和非正式的语言学习环境。

四 语言能力倾向研究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

语言能力倾向研究在教学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可以应用于招生录取、分班、改进课程设计使之更加符合学生需要,也可以应用于对学生的学习困难进行诊断,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

语言能力倾向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学习者将来的语言学习成绩作出预测。在语言能力倾向研究中,常常要计算语言能力倾向测验与语言水平或语言成绩测量之间的相关,以便确定语言能力倾向测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预测学习结果。使用语言能力倾向测验来预测学生的语言学习成绩,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挑选那些在将来的语言学习中可能获得成功的学生,这是招生录取工作应该考虑的重要方面。

语言能力倾向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确定学习者个人的语言能力倾向特点(例如哪个方面比较强,哪个方面比较弱),在此基础上为不同的学习者提供适当的教学方式。一般来说,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倾向有不同特点,有能力倾向强者和弱者,有不同类型,例如分析型和记忆型。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不同的学习者的效果可能不同。为了适应这种特点,我们可以采取三种教学策略:

- 1 将学习者按个人能力特征分班或分组,然后为不同组提供适当的教学方式。由于学习者学习的能力和速度有差异,因此我们应当知道这种差异,了解这个特点,使我们的课程设计、教学方法能够反映这种差异。例如为了适应这种特点,让分析型的学习者接受难度适当的分析型学习材料,记忆型的学习者接受非分析型的材料。也就是说,可以将语言能力倾向信息应用于分班或分组教学,以提高不同学习者进步的速度。

- 2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教师也应当尽可能了解学生的能力倾向特征,并在课堂上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以适应学生的不同特点。

- 3 对学生的学习困难进行诊断。利用语言能力倾向测验,了解学生在某个学习任务上完成得特别好或特别差的原因,对学生的学习困难进行诊断,给学生提供咨询和学习辅导,帮助学生掌握适当的学习策略,使他们适应课堂的要求以及在课外继续学习。

总之,利用语言能力倾向测验,不仅可以对学生将来的语言学习成绩作出预测,而且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能力倾向特点,使课程设计更加符合学生的需要,加快不同学生的语言学习速度。可见语言能力倾向研究对语言教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陈 宏(1996)第二语言能力结构研究回顾,《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陈 宏(1997)汉语能力结构差异的检验与分析,载王建勤主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北

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荆其诚(主编)(1991)《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湖南教育出版社。

张凯(1995)语言能力模型和语言能力测验,载《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凯(1997)语言能力与外语能力的同质性,载王建勤主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郑日昌(1988)《心理测量》,湖南教育出版社。

朱智贤主编(1989)《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achman, L. F. (1988) Language testing - SLA research interfaces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9, 193- 209

Carroll, J. (1981) Twenty-five years of research on foreign language aptitude In K. Diller (e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Universals in Language Learning Aptitude*, pp. 83- 118 Rowley, Mass : Newbury House

Carroll, J. (1990) Cognitive abilities in foreign language aptitude: then and now. In T. S. Parry & C. W. Stansfield (eds), *Language Aptitude Reconsidered*, pp. 11- 29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Hall Regents

Carroll, J. B. & Sapon, S. M. (1959) *Modern Language Aptitude Test (MLAT)*. New York: 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

Carroll, J. B. & Sapon, S. M. (1967) *Modern Language Aptitude Test, Elementary form*. New York: 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

Cummins, J. (1979) Cognitive/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the optimal age question and some other matters *Working Papers on Bilingualism*, 19, 197- 205

Ekstrand, L. H. (1977) Social and individual frame factor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comparative aspects In Skuttnabb-Kangas (ed), *Papers from the First Nordic Conference on Bilingualism*. Helsingfors: Universitat

Ellis, R. (1985)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erencich, C. J. (1964) *Reattivo di attitudine linguistica*. Florence: Organizzazioni Speciali

Gardner, R. & MacIntyre, P. (1992) A student's contributions to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art 1: Cognitive variables *Language Teaching*, 25, 211- 220

Gardner, R. (1980) On the validity of affective variabl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onceptual, contextual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Language Learning*, 30, 255- 270

Genesee, F. & Hamaya, E. (1980)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1, 95- 110

Genesee, F. (1976)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Learning*, 26, 267- 280

Henmon, V. A. C. (1929) Prognosis test in the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In V. A. C. Henmon (ed), *Prognosis Test in the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pp. 3- 31. New York: Macmillan

Krashen, S. (1981)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Pergamon

Luria, M. A. & Orleans, J. S. (1928) *Luria - Orleans Modern Language Prognosis Test* Yonkers: World Book Co

Murakami, K. (1974) A language aptitude test for the Japanese System, 2, 31- 47.

- Neufeld, G. (1978) On the acquisition of prosodic and articulatory features in adult language learning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34, 163- 174
- Parry, T. S. & Child, J. (1990)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RD, MLAT,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T. S. Parry & C. W. Stansfield (eds), *Language Aptitude Reconsidered*, pp. 30- 66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Regents
- Pinsleur, P. (1966) *Pinsleur Language Aptitude Batte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tch
- Rice, G. A. (1929) The Barry Prognosis Language Test. In V. A. C. Henmon (ed), *Prognosis Tests in the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New York: Macmillan
- Skehan, P. (1982) Memory and Motivation in Language Aptitude Testing.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 Skehan, P. (1986) Where does language aptitude come from? In P. Meara (ed), *Spoken Language*. London: Centre for Information on Language Teaching (CLT).
- Skehan, P. (1989)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 Skehan, P. (1991)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13, 275- 298
- Spolsky, B. (1979)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F. Eckman and A. Hastings (eds), *Studies in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 Spolsky, B. (1989) *Conditions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oddard, G. D. & VanderBeke, G. E. (1925) *Iowa Placement Examinations, Series FA - 1, Revised, Foreign Language Aptitude*. Extension Division, State University of Iowa
- Wells, G. (1985)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he Pre-School Ye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lls, W., Wesche, M., & Sarrazin, G. (1982) *Test d'Aptitude aux langues Vivantes* (adapted from Carroll, J. B. & Sapon, S. M. (1959)) Montreal: Institute for Psychological Research
- Wesche, M. (1981) Language aptitude measures in streaming, matching students with methods, and diagnosis of learning problems. In K. Diller (e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Universals in Language Learning Aptitude*, pp. 119- 154.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作者简介

江新,女,199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获硕士学位,1996年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曾发表《词汇习得研究及其在教学上的意义》《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等论文。

《中国社会语言学》出版

南京大学中文系郭熙副教授的新著《中国社会语言学》最近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立足于中国社会和汉语的关系,阐述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相关问题,从而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作者注意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就语言国情、语码转换、语言的生态保护、语言政策和当前中国社会的语文生活状况等发表了系统的见解。全书23万字,资料丰富,语言平实,书末附有详细的参考文献和索引。

【本刊供稿】